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

复兴社的缘起

康 泽

酝酿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人员被殴打。同年10月底和11月初，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蒋介石利用蔡元培这块老招牌，叫他出来应付学生，蔡也被打了。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对学生讲话。他急中生智，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受军训，把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总算用这个办法解了围。但，这是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把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我那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的“剿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也跟着这形势结束了。

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

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照他的意思去办，而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一年（1931）的11月初，他在南京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我约十来个人（邓文仪那时是蒋的侍从秘书，每次开会，都是他担任记录）开会。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会虽散了，而事情还只是刚露一点头，以后怎么办呢？第二天贺衷寒就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的家里去谈。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我们要体会老头子的意思。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说来说去，还是个无头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又是“会”无“议”地他讲完了就散会了。贺衷寒又把这些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才谈出来了一点头绪，就是人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妣，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法

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足够的。”这时，我也立起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就结束了这次的会。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大家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几个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不久（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离开了“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这班人（即叫去开会的十来个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鄧悌等共两桌人。大家一面吃饭，一面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在吃和谈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此时大家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他提出意见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立即推举了贺衷寒、鄧悌、滕杰、周复和我五个人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他说完后，就退席了。过了一天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我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緝、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至此，参加这个活动的共约 30 人。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甘心滚下政治舞台，而是以此作掩护，想在风浪中创造更安全地上台的条件。事实正是这样，在下野期间，他和汪精卫勾结好了，由汪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他当委员长，负责军事；把林森抬出

来作傀儡主席。这样，责任由大家来分担，而实权还是由他掌握。其目的在于减低目标，以便渡过风险。布置妥当以后，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复职之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那个“组织”。他把他和他的反动政权的安危的赌注就押在这一点上。因此复职之后，他立刻又召集这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对这个“组织”开会研究过没有。回答是：开过会，并推举了五个人筹备。这时贺衷寒就把他起草的章程，我把我起草的纪律条例交给他看。他都收起来了。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两个：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我主张用“复兴社”。而酆悌自己又另外搞了一个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地袖呈蒋介石。蒋以他不是起草人，交我们作参考。以后蒋又召集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名称就用“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都可以。

社章的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主要的是：

- (1) 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 (2) 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爱国二字记不准确）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 (3) 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 (4) 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16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

誓词也是一般性的，大意如下：“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 (1) 不得违抗命令。
- (2) 不得有小组织。
- (3) 不得泄露秘密。
- (4) 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

(5) 不得贪赃纳贿。

(6) 不得狂嫖滥赌。

(7) 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蒋介石复职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开会时，拿出一张纸条，写有四句话：“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这些人当然奉命唯谨，齐声回答说“好”。以后对这四句话，既不敢增一词，也不敢减一字，永远就是这四句空话了。

以上是 1931 年 11 月初到 1932 年 2 月底的情况。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几个问题：用什么名义的问题，用什么政治纲领的问题，用什么组织原则的问题，都初步地解决了。蒋介石腹中的法西斯胎儿已具眉目，只等呱呱堕地了。

成立时的情况

1932 年 3 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这个法西斯组织的人（贺衷寒、鄧悌、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愷、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戴笠、郑介民、邓文仪、邱开基、梁干乔、侯志明等约 40 人）开大会，蒋介石自己是当然主席。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他在陆大读书，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不揣冒昧地一口气跑来参加大会；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来，把冷欣向门外推，连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蒋介石把这个不速之客撵走，紧闭大门以后，才又回到主席台来，主持大会的进行。他首先宣布复兴社今天正式成

立，接着讲了一段话，原词记不清了，大意是鼓励大会的参加者今后要一心一德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之后，进行选举（蒋介石是“真命”社长，大会选举权不适用于他），选举了以下的一些负责人：

（1）复兴社中央干事九人：贺衷寒、鄧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2）复兴社中央监察三人：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候补监察一人：甘国勋。

选举完毕以后，大会就闭幕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大会的决定，还要经过社长的批准才能算数。因此这次（第一次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呈报社长批示，当晚他就批准了，并指定了：（1）常务干事三人：贺衷寒、鄧悌、滕杰，以滕杰为书记。（2）常务监察一人：田载龙。（3）各处处长：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特务处处长这时还空着，没有指定人。直到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在他陵园别墅召集原来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以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他没有再说什么，就叫我们出来了。他跟着出来开会，首先就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大家都不大满意戴笠，特别是郑介民很不心服，长期不安于位。1932年至1938年间，郑再三向我诉苦，要我另外保他一个什么职务。（开成立大会时，我因率领首都记者考察团到淞沪去视察，没有参加，以上关于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况是事后知道的。）

至此，这个组织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正式形成了。但他的行动一开始就和他所说的政治纲领相反，请看以下的几件事实：

(1) 1932年2月下旬，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为了讨好蒋介石，发出一个通电，号召各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军政头子们，要求蒋介石恢复他原来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在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十来个人开会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知道。”我又问：“是不是委员长授意的？”他说：“不是。”我就向他陈述意见说：“我看这个时候，恢复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没有必要。因为恢复了这个名义，也只能指挥这些部队；不恢复这个名义，还是指挥这些部队，那又何必恢复。而且恢复了这个名义，徒然使国内的敌人有所借口，使国外的敌人生疑，怀疑我们在作抗口准备，反而不好。”他说：“是的。”马上就叫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打电话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取消这个通电。

(2) 也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同学杨周熙（当时在军政部所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我审查这本书，并考核这个人。我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我向蒋介石呈复，说他是投机，意思是此人不足取。但蒋介石没有听取我的意见，只是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以“复兴运动”四个字来代替，即把书名《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变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后，内容照旧，将书出版了。杨被批准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是和“法西斯”相等的。

(3) 在“复兴社”成立以后一个多月，即1932年4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又召集我们这些人开会，又拿出一张纸条来，上面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叫我写个宣传大纲。我揣度蒋介石的心理，根据他

纸条上的两句口号，写了十五六条。这十五六条是一贯的，一个思想系统。不料潘佑强看了，要在第六、七条之间加一条“对日宣战”。我观察蒋介石的意思和当时的情况，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潘的意见。这个问题经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争论不决，只好在另一次蒋介石所召集的会上提出来由他作最后决定。我为了和潘佑强保持友好关系，不使他当场挨骂，没有把他“对日宣战”的意见对蒋陈述，只是把我所拟的十几条念给蒋听。他听过之后，说可以、可以就作了决定。潘佑强只好哑口无言。

通过以上三事，可以认识到“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觉悟了的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的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当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1—1932年），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刘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住洪武路。蒋介石叫我去考核他。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住一间房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题。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就照我对他的印象呈复了蒋介石。蒋见他之后，印象也好，因此就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过常务干事会通过、蒋介石的批准，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我是常务干事会推定的监誓人。

刘健群加入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有一次蒋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随即任命刘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的建议，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由刘负责。军委会

政训班招考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 500 人，予以六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何浩若、训育组长梁干乔、总务组长 x x x、总队长阮齐的任用，都是经过我同意的。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 年 10 月这个班训练期满。这时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回不了了。

蒋介石自始至终只知道他的政权动摇了，要搞个什么东西出来把力量更集中于自己的手中，采取白色恐怖的手段把革命的浪潮镇压下去，使他的王朝长治久安。最初他认为苏联的“格柏乌”很有力量，想学“格柏乌”的组织形式；后来发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一套与他的意图不谋而合，就于 1932 年至 1933 年间派了两批人到德意两国去考察（实际就是去学法西斯）。第一批派的是酆悌、柳克述、骆德荣、张元良、胡轨，由酆悌领队。第二批派的是潘佑强、杨周熙、李国俊、方超，由潘佑强领队。两批考察的时间各约一年，回国后，都有考察报告。杨周熙个人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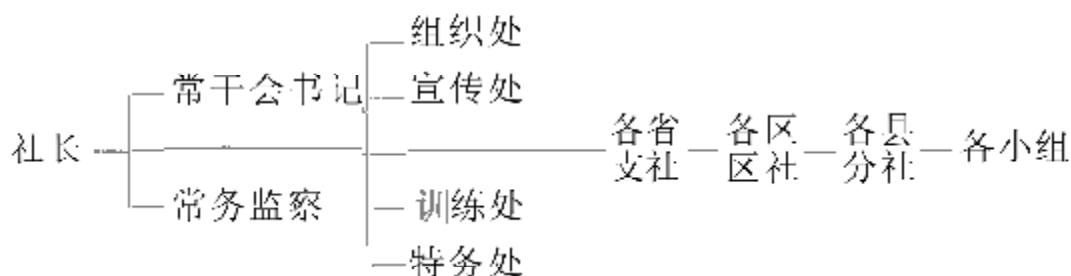
有一个报告。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把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一套拿到中国来实行，而是把他们所学来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头换面地运用出来。例如杨周熙的报告中，要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个别动队。那时我正奉蒋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就把杨的报告交我参考，我就呈奉蒋介石的批准，采用了别动队的名称。

组织和训练

(1) 组织的发展：

复兴社自 1932 年 3 月初成立后，常务干事会每周开会一次。一次组织处提出常干会首批成立四个支社，即：1. 派任觉五建立南京支社，以任为书记，并筹办刊物；2. 派叶维建立上海支社，以叶为书记，并筹办刊物《抵抗》；3. 派贾毅建立北平支社，以贾为书记，并筹办刊物；4. 派甘国勋建立武汉支社，以甘为书记。当时还预备建立广州支社，因无适当的人选没有派出。

组织的系统如下：



蒋介石向我们原来的十米人曾指示吸收同志、发展组织的原则：1. 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2. 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时要放宽一些。这是 1932 年 3 月初的事。

复兴社历任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如下：

第一任书记滕杰。1932年3月1日—1933年1月2日。

第二任书记贺衷寒。1933年1月20日(?)—1934年8月。
(贺就任前的一段时间白萧赞育代理。)

第三任书记酆梯。1934年8月—1935年10月。

第四任书记刘健群。1935年10月—1937年9月。(1936年8月—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

第五任书记康泽。1937年9月—1938年4月。

蒋介石下手令派复兴社书记用字有区别，对滕杰、贺衷寒、酆梯三人用的是“书记”二字，对刘健群和康泽二人是“书记长”。

(2) 开办训练班：

复兴社成立期间，军校学生在南京的有270多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在军校设立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班人，派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定训练期为三个月。主要的课程是：(1)教复兴社的一套“领袖论”，拥护唯一的领袖(蒋介石)复兴中华民族；(2)党派的批判——所有一切党派都不合当前“救国”的需要，只有拥护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3)领袖训话——蒋介石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每周一次；(4)特约讲演——借“名人”的威望，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等等。此外还设有合作社的课目，这是为训练十来个残废的学生预备将来为复兴社搞财贸工作的。负责这个课程的，是一个留英学生，名叫张国维。最初他不是复兴社分子，后来才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在受训期间，表现得很守纪律，蒋介石很高兴；毕业后，派了五六个人到《中国日报》工作，派了约20人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工作，派了一二十名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派了几个到“厚生消费合作社”工作。戴笠挑了30名去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是戴笠

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其余 100 多名派赴武汉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担任政训工作。不成问题，这批学生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1932 年 4 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又是萧赞育建议，成立一个宪警训练班，以孙常钧为主任，假朝天宫为班址，训练期为四个月(?)。原拟训练期满后，分配各省深入到宪兵警察的组织里去，结果不很理想，没有照预期的目的派出去，后来有缝就钻地搞别的事去了。当然这些学生也大部分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此外，还有刘健群搞的军委会政训班已如前述。

(3) 出版机关报：

1931 年 10 月间我结束宣传大队时，就想办一个《中国日报》，在酝酿复兴社组织的过程中，我曾对蒋介石提过。1931 年 12 月蒋介石下野后，在他的老家（浙江奉化）写一个纸条给我，叫我拿他的条子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那里领取 3000 块钱。我领到这笔款子后，就接收南京的《建业日报》（军校调查科陈莫南等几个人办的，办得债台高筑，奄奄一息，陈找我接办）作底子，筹办《中国日报》。1932 年 1 月 1 日创刊出版。同年 3 月初复兴社成立后，就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我是复兴社宣传处长兼《中国日报》社长。

(4) 掌握有关单位和社团：

在 3 月间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扩大复兴社的影响，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去任处长；把军校的毕业生调查科扩大为处，派萧赞育去任处长，代替田裁龙；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还有一个“拔提书店”（“拔提”的名称是采英文党派“PARTY”音），是邓文仪两年以前用同学会的名义办的，经费来源，是临时向蒋介石要一点和在同学中募点捐，自成立之日起，年年亏本。复兴社成立后，邓即请求将书店移交给“组织”（复兴社）。经社批准，这个书店就成

复兴社的书店了，而实际负责的还是邓。它主要的是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籍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等。

(5) 成立消费合作社：

前述“特别研究班”设有合作社的课程，训练十来个伤残的学生。毕业后，蒋介石拨发 10 万元开办“厚生消费合作社”，指定李一民、张国维、贺明宣三人为理事，李一民为理事长。这个合作社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供应粮食煤炭给复兴社社员和市民，美其名谓免受商人剥削，保障他们的生活，并代收复兴社社费。

(6) 搞工农运动：

还在 1932 年 3 月初复兴社成立以前，有一天蒋介石单独召见我，对我说：“你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人，介绍到组织里来，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因此我就把梁干乔、傅胜兰、俞季虞、王新衡、陆梦衣等引见蒋介石。蒋见之后，批准他们参加了复兴社，并对我说：“这些人都是很平平。”又一次蒋介石视察南京老虎桥监狱，看到几个留俄学生又看到几个中学生，回去之后下个条子给我，叫我把周天僦等几个人保释、考核、试用，中学生交我保释、考核、复学。我都照他的指示做了。蒋的动机是想在这些人中，物色他所中意的人搞工农运动，笼络一部分工农群众，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结果，这班人都是醉心于升官发财的，谁也不愿去做工农工作，因此他想搞的工农运动还没有开始就流产了。

内层和外围组织的成立

(1) “力行社”的成立：

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1932 年 4 月间），在一次常务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为了更为秘密，还要有个内层组织。大家没有异议，同意了他这个意见。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这些人谈话时，贺衷寒就向蒋报告，在复兴社内部成立一个内层组织“力行社”。蒋介石认为可以，并指示了两条原则：1. 不另成立干事会和各

级机构；2. 力行社社员必须经他自己批准。最初搞得很认真，煞有介事地搞了一批人报蒋批准为力行社社员，但没开成立会。不久，只有其名，并无组织的活动。

(2) “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立：

复兴社成立不久，1932年3月间（成立力行社之前）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简称“军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五人为“青会”干事，康为书记，刘为助理书记；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军会”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当即呈报蒋介石批准成立。顾名思义，“青会”发展的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军会”发展的对象是军校学生。

大概在1934年至1935年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很大的时候，总社常务干事会决定，报请蒋介石批准，各省支社可以根据各地方具体情况成立各种外围组织。因此又产生了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忠义救国会在沪、宁等地成立得较早。

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不仅在复兴社之后，而且在复兴社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之后。

以上所述的蒋介石自己所搞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正统”的法西斯组织，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大出名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杂牌”法西斯组织。这就是张学良到意大利去戒烟回国以后，当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时，向蒋建议，学习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搞了一个“四维学会”，以蒋介石为会长，张为副会长。主要的政治口号是礼义廉耻（所谓国之四维）和拥护领袖之类。这当然也合乎蒋介石的胃口，同意张这样去搞。可是蒋对张是不放心的，指派了几个他的“正统”主要法西斯分子贺衷寒、邓文仪、邱开基、戴笠、梁干乔等插到这个组织里面去。它的活动范围是东北军，大概在“双十二”事变以

后，就无形地解体了（关于四维学会的情形，是梁下乔告诉我的）。

复兴社成立后 头一年我所知道的几个案件

（1）1932年3月初，有一个军校第二期的学生葛武荣（当时任南京市党部委员）经过介绍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以后，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写了一封信向陈立夫报告。有一次贺衷寒到陈立夫那里去，在陈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贺乘陈之不备，把这封信偷回来了，由监察提出弹劾，报告蒋介石。蒋骂了贺衷寒一顿，说他不该偷信，而对葛并没有按照复兴社纪律条例惩办（泄露机密者处以极刑），却把他调往西北，交胡宗南管制任用去了。

（2）1932年4月间，蒋介石到武汉去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把贺衷寒调去任总部政训处长，派邓文仪兼任调查科长。他们到武汉后，复兴社的组织在那里很快地发展起来。广东的陈济棠闻风，派人到武汉来调查情况之后，到长沙去联络何健反蒋。这个人走水路到武汉来的，听说武汉有复兴社分子500多人在活动，不敢下船，走同乡的路子，找了一个广东人到船上去谈，恰恰找了一个复兴社分子。这个人乘机吓唬了他几句，他就乘原船溜走了。

（3）1932年五六月间，李济深派了一个人（军校四期生，湖南平江人）到武汉来活动军校后期同学反蒋，被复兴社知道了，报告蒋介石。蒋决定把这个人抓了，交邱开基（那时帮助邓文仪搞特务）问了一下，关了几天，就秘密处死了。这事是我到武汉时邱开基自己对我说的。

（4）1932年7月间，复兴社在武汉活动的特务分子调查到某一个县长有贪污行为，蒋介石就批准把这个县长杀了，说“杀得好，杀一儆百”。

(5) 1933 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曾下命令禁止赌博。他的法西斯喽罗到各处去探听，发现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公馆里有人打麻将，就向当时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书记滕杰报告。滕就直接命令这几个人去抓。他们到吴的家里，长驱直入，一直跑到楼上麻将桌前，先照相，后把麻将牌和钱都收到一起。对打麻将的人说：“委员长命令不准赌博，你们为什么赌博？”吴家白以为是堂堂的首都警察厅长公馆，谁敢来抓赌？！这一下，出乎意外，都愣住了，莫名其妙，对这些人无可奈何，任他们去搞。吴因此事不得不向蒋辞职。蒋当时未准，以后才借故把他免职了。而对滕杰，当时就下令免去复兴社的书记职，叫萧赞育暂时代理。后来蒋对滕杰说：“你为什么这样幼稚，使我为难。”过了不久，方正式派贺衷寒为第二任复兴社书记。

（董益三记录、整理）

复兴社述略

萧作霖

我是在中华复兴社（以下简称复兴社）成立一年后才加入的，曾任过它的公开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总会秘书长，主编过它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并先后任过它的湖北省分社和河南省分社书记，但未参与过它最上层的核心活动，因而对于其中许多机密大事和内部复杂情况也不甚清楚。

复兴社的起因和组织概况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蒋介石感觉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不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因此，他就一面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以缓和当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气氛和激烈行动；一面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结合的爱国运动。他企图用这种手段来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使之化为维护国民党政权和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

当时形势下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个运动，必须要有一批忠实可靠的骨干来推动，在他看来，这批忠实骨干只有利用其最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

1932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也就没有采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酆悌、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为外围组织^①；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由蒋介石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

^①据本书康泽的回忆文章，力行社是复兴社的内层组织，成立于复兴社之后；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是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等是后来成立的外围组织。

中学生，此外便是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入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入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入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入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公务。各省市设分会，分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察及对 CC 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

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级负责人。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入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入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入社的条件。如会章规定会员每月收入在 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 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入会表和入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入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入会和入社的宣誓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誓。宣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举行的。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会、分会除有

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 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少在 10 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 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来。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

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津贴的。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上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和达到

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复民国 13 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 1933 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

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讲演，也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如他在所著《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

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 1933 年 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

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①。直到 1934 年 7 月在我主编的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藜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寿、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

^① 《中国革命》周刊各期一些较主要的文章题目摘录如下：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复兴民族方案之商榷、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剿匪军事之进展、意国法西斯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的研究、法西斯主义之思想、国社党的起源及其成因、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新兴土耳其国民文化运动之发展、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等。

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①。其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颇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期刊有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于 1933 年 8 月在北平创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论性的论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谣诽谤、耸人听闻的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闻之类的社会新闻，借以迎合一般有闲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趣味，发行量颇大。此外，还有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为大型的理论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 1934 年 7 月合并于《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间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口

^①在该刊第一卷的后几期，即有如下一些文章：《法西斯蒂的国家——极团的国家》、《法西斯国家的概念》、《法西斯主义之政治与社会理论》、《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原理》、《法西斯治下意大利的经济制度》、《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精神史观》、《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

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山复兴社分子担任编辑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组织所运用的，计有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的《中华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上海的《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乐群》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杂志》，等等。各地组织和会社员个人还办了许多小型报刊。各军校政训处和各级部队政训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军校政训处发行的《黄埔月刊》，连同各级军队特别党部和各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在内，估计至少在 100 种以上。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 年它发行过山汪漫铎主编的一种文艺月刊和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 50 号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部国联秘书厅编辑、内外通讯社翻译的《国际联盟军备年鉴》（1933 年的）及《青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约 20 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讯社编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 40 余种。“内外通讯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设立、由吴寿彭主持的一个编译机构，主要是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的专文专论。这个书局设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消而停闭了。此外还有刘炳藜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及其他几部书，但终于没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较之 CC 团是远远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没有一套全面的计划和集中领导，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许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编人胡乱发表言论，而且翻来覆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这一套滥调。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连那些编辑者和撰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人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 1933 年 12 月 25 日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文化运动，以转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经邓拿去给蒋介石看了，蒋大以为然，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员，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 14 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

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引文化界人士参加，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藜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 1934 年 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藜、孙伯鸾、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路 76 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入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 20 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城、刘炳藜、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漫铎、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约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的学

生，以及少数高中学生。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他们的队长赵龙文（浙江警官学校校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是大中学生，约共有千余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队后和左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赵龙文领头举着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我被请站在主席台正前监誓。然后由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到前面来的护旗兵接着，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蒋坚忍等在主席台上的 10 余人，陪同我下台从营横队的排头走到排尾进行了检阅。接着由我代表总会授剑和代表上海分会赠刀，我和蒋坚忍等讲话，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乐礼成。当时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浙江省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个由警官学校校长任队长的所谓“文化前卫队”，这个完全按照陆军仪式进行的所谓宣誓典礼，又加上授剑赠刀这一个突出的节目，总合起来，便明明白白是“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实在是表征法西斯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当时中国文化学会和复兴社把这个活剧认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创举和大事，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分会于成立后，除了继续征求会员和有时开开座谈会，并曾举行过几次讲演会外，因为要集中力量对 CC 团的文化建设协会进行某些争夺的活动，还没有计划到怎样来具体实行“我们的主张”。我和刘炳藜认为首先还得有一个文化统制的思想运动，才能顺利展开我们的文化运动。因此，经过分会理事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些讨论以后，组织了一套专论，于《前途》月刊二卷八期出了一个文化统制专号，有吴铁城等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有《统制真诠》、《人类统治思想的演进与三民主义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我国文化统制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制阶段》、《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统制文化

以救亡图存》、《统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统制的目标及方法》、《文化统制与文艺自由》、《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教育统制的性质和条件》、《文化统制宜先于经济统制》等等。所有这些文章的“微言大义”，总不出我和刘炳藜这两个主要发起人所举的要旨。我在文中说：“我们要将文化限制于人类共同生活和社会演进的范围之内，就是文化统制。文化统制不在成立一个统制机关，要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复兴民族、夺回民族生存权的抗争精神，为今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刘炳藜在他的文章中说：“惟有把自然统制于人力之下，惟有把由人力向自然开辟所得来的文化控制于民族精神之下，以民族精神为最高指挥，民族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为最高指挥之执行者或代表，文化为手段或工具，前者统制后者，把人力即民族精神力或精神作用加于自然开辟的过程之上，即自然被统制于文化，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这个专号，虽遭到一些进步报刊的抨击，但也是中国文化学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各地分会及与复兴社有关的各地报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专号出版以后，我们曾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来函来稿，即我个人也接到好几十封这种来信，以致不暇作答。当时我和刘炳藜都认为这个文化统制的思想运动，是会开展得下去而将收到极大效果的。可是这时中国文化学会却因受到 CC 团的借故进攻而奉令取消了^①，从而我们的所谓“中国文化运动”也整个都顿成泡影了。

在中国文化学会存在的短短八几个月期间，是复兴社法西斯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各地组织的宣传活动都活跃起来，使会社员大大增长了一些“精神作用”，对社会也起了一些较深的影响。

^① 中国文化学会被取消的原因详见“复兴社和 CC 团的斗争”一章。

复兴社特务体系的活动的几个方面

复兴社组织也有一个“政治纲领”，只记得大意是：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全国唯一领袖，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复失地，保持领土主权之绝对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平均地权，促进农业发展；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厉行国民军事训练；彻底澄清吏治；普及平民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等等。其实只有“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两条是其真正的根本所在，复兴社的一切活动，都本乎此。

法西斯是对内统制和对外扩张一个总体性的特务行动体系，蒋介石既不可能有对外扩张的条件，而只有对内统制的野心，因此他的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矛头也只是对内的，但也是总体性的，不论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经济机构和文化教育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业机关以及陆海空军部队中，都有着它的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以复兴社组织为核心的这个特务体系，还只是其总体的重要部分之一，而主要范围是被划定于军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

关于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就是陆海空军部队。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机关，于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多数都是复兴社分子。其主要活动除进行反共的宣传鼓动外，便是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和学生的思想行动，不仅对于非嫡系部队和杂牌队伍如此，即对嫡系部队的部队长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官参加组织，黄埔学生出身的带兵官，尤其是师长以上的非经特许也不能参加，只有少数如胡宗南、黄杰和桂永清等是例外。其他也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参加了组织，则或者是没有被他知道或者是派在非嫡系部队负有特殊使命的。他不许掌

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因此，他们在所派驻的各嫡系部队中，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非但不去监视，反而趋附逢迎，尽力献殷勤讨欢喜，希望能博取部队长的信任，转入带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队的政工人员也一样，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势，作为依附投靠或要挟敲诈的本钱。非嫡系的部队长对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有些也就乐得满足他们的欲望，给予军职，以拉拢他们；大多数则是采取送钱收买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员都乐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队去，因为既可得到上级的特别重视，又可有捞官捞钱，比派到嫡系部队去要好得多。1936年我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任设计委员，经常同他们许多人接触。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一般都是愁眉苦脸或大发牢骚；而被派在非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却大都笑逐颜开，非常活跃，请客送礼，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他们不仅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们的新主子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训处长王汝洋（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认识，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训人员对所有各级部队所起的统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间作用。这一点，政训机构的总头子贺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说：“部队政治工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将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领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方面，政训人员的罪恶活动

所起的破坏作用则是很大的。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驻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军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党。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令条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连他们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警察司法机关，则更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要说是对付共产党，他们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当时部队和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的各级军官和学生，对政训人员别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他们给戴“红帽子”，而他们却有的就是“红帽子”，可以随便加到任何一个人头上去的。因此，一般军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们，却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红帽子”是谁也顶当不起的。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们——贺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是通过他们来掌握指挥这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并不过问。政训系统的各级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甚至有些军师政训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并且贺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组织只是通过他们个人的作用去贯彻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也是以陆海空部队和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成立特

别党部，由各该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员；所有书记长以下人员，则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训处长兼任书记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连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员，有些也是由政训系统人员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入党的手续，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不入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各级特别党部，也因为没有什么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军队党务系统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经费，占领这个阵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领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下的军队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黄仲翔负责掌握的，并不听命于中央党部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的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全国青壮年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是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也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队，轮流调训青壮年，以3个月为一期，并实行军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负责。中等以上学校，则按学生人数编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军训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军训教官实际负责。各校除实施军事训练外，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规定：“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对于军事教官之命令须绝对服从，严守军纪风纪，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陆军惩罚令及陆军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见1932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委员会出版的

《军训》。)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规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全被控制于军事管制之下。各校军训教官更利用这些规定和他们的权力，对学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兴社组织，大都是由军训教官负责的。除了各校实行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于每年暑期举行各省市本届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校一年级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3个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训练总监部（实际上是由国民军事教育处）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总队设训育委员会，其主任委员则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书记或其他高级骨干分子担任，负责进行政治教育和训育，总副队长不能干预。1937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训，即由我兼任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总队长是新五军军长郜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军训主任委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遴调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

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 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编入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织内部情况一斑

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1935 年酆悌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经酆提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开共（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

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 20 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許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中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径自离场，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

日在湖北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周低头。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命精神”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

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

1934—1936 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安处副处长），陈祺为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庚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祺胡作乱为，竟将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祺和吴庚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陈祺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务站的猎犬。吴庚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入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悚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之为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

府去闹事。萧洒、陈祺等又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庭恩等人。

复兴社和 CC 团的斗争

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 CC 团和政学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 CC 团认作是蒋介石的“螟蛉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 CC 团自然必须坚决加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 CC 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予，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对 CC 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谈不上是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 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围，CC 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 CC 团的范围，这样，就迫使 CC 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 CC 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坐视 CC 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

没有让这个“螟蛉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 CC 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 年我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 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 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分子与 CC 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 CC 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 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起来，简直把 CC 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入骨。因此，1934 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

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 CC 团在各大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 CC 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多地方是 CC 团占优势，但凡是 CC 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

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荣、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鄧悌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鄧悌、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长期

问，“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诨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鄧悌，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一，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啥，有奶便是娘，不过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棨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滕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

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 C.Y.，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 1927 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

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佑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湖南派”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的，鄂悌、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记长。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锋的种种表现，还表示满意，因为这正是他所要利用贺衷寒的所在。蒋的算盘没有错，贺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对了的。由于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理论，也就在复兴

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与胡宗南并驾齐驱。在复兴社的头目之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因此，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何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人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 年后，他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 1942 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 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没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二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

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但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坦，行动即是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又时而呼之使来，他却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地向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儿如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反共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反共间谍活动的借口。1932年初，他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博士硕士之类的文人政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毓九等

凭借这种关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衣（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人家都可以作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东扯西拉、长篇大论地写文章硬交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出版社、通讯社和报纸杂志，甚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在他任助理书记的期间，书记长虽屡经更换，而他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组织的看家人，并且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调解内部纠纷方面出了不少力量，因此才得被任为书记长。“西安事变”后，他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见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用。抗日战争后，仅得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训系统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他被撤后，由萧赞育接替），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说，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他们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康泽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组织成立之初，他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突出表现其热衷于

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垦子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组织“别动队”，在进行“剿共”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活动，对人民所施镇压和屠杀之残酷惨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书记长，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并更换了许多分会书记。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还继续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别主持中央训练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个训练班时，他还对我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力，可见秘密组织要比公开组织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组织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组织可比。”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如何念念不忘于他那个充满血腥气的别动队了。

远在1930年，戴笠即自动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毛庆祥（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和我谈，最初戴笠经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请求转呈于蒋介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门送到厨房交给厨师或勤务兵，也不问有没有什么反应。毛庆祥起初并未加以注意，也就懒得为其转呈，后来看到那些情报中有些也还有点意思，便开始转呈给蒋介石看。蒋看了几次，便交给戴一点钱作活动费。从此以后，戴便开始雇人进行活动，情报也就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充实了些。蒋看了很满意，便亲自召见表示嘉勉，并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仗进一步组织起秘密机构，大肆活动起来，并直接向蒋报告请示了。到1932年春天复兴社组织成立时，戴便成了当然的特务处处长，因为他的特务机构早就存在，已有了相当基础，并且久已为蒋所直接使用的了。其后直到他死为止，他搞了15年的特务活动。

最后，还必须介绍一下胡宗南这个人，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并没有负实际责任，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似的。其实他正是一个有极大政治野心、极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早在 1930 年，他驻防开封时，即与冷欣等，秘密组织过所谓“三民主义大侠团”，这是在“西安事变”时萧洒向我说的。我和胡宗南直到 1936 年才相识于开封。当时他任第一军军长，驻防徐州，某次因事过开封，特来访我，谈得很投机。不久我去南京，事先并未通知他，他竟于我车过徐州时，亲到车站接我下车，强留我在他的军部住了一天，又谈得很欢洽，从此便交往渐密。在屡次深谈中，我才发觉他有意图取中原作为基地，并有意于谋取统制复兴社整个组织，他的野心是不下于蒋介石的。他在黄埔系将领中，由于受到蒋的特意培植，由第一师长而第一军长，升擢总在人前，部队编制也特别大，军饷特别多，而保举人员又无不照准（蒋介石对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都必直接遴选或核委，仅胡宗南、陈诚和汤恩伯得自行遴选保举军师长）。因此，他的实力日增，声望日隆，成为黄埔军人中无人可与并肩的第一位红人，他也俨然以黄埔系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自居。同时，因为蒋介石特别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大家以为蒋必有其特殊用意所在，所以都对他特别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他便也俨然以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自居。黄埔学生一般都自命为蒋介石的嫡子，而胡宗南则更以“太子”自许。1939 年他和我在西安有一次纵论历史人物，他故意特别推崇李靖而以之许我，最后却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弦外之音，他竟然以李世民自况。他于 1937 年即奉令率军入陕，驻屯西北历 12 年之久，统兵至五六十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成为实际上的西北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而其唯一的任

务与企图，就是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这个革命根据地和镇压西北各省的人民起义。他除了强征民工围绕陕甘宁边区筑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并以庞大兵力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带的居民实行严酷的军事管制和坚壁清野等种种残暴措施。他还在陕、甘、宁、青全面施行联保连坐以及在“剿共”省份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统治法令。凡复兴社在西北各省的地方组织和军队、政训、国民军训各个系统，都直接控制在他掌握之下而惟命是从，一任其驱使利用；即便是绝对独立的戴笠特务系统，其派驻在西北各省的机构，也同样不能不听从他的指挥。所有复兴社内外系统在西北进行的种种法西斯特务活动，在其直接发纵指示之下，较之其他各省尤为猖獗。胡宗南的封建统治思想极其强烈。他在复兴社这个封建法西斯组织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纵指示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复兴社被解散以后的名亡实存

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承认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就不得不宣布将这个专门以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为唯一任务的复兴社法西斯秘密组织解散，而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是复兴社整个组织则变成了三青团，复兴社的会社员中除了极少数人从此脱离了组织关系，并未转入三青团去的以外（我即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一律变成三青团员。原有各省市分社也一律改成了三青团支团部，并立即都挂上了这块新招牌。原任书记也都一律成了三青团支团干事长。复兴社总社的全体干事、监事及其他一些高级骨干分子，都成为三青团的筹备委员和三青团成立以后的中央干事、监事。康泽则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处长，掌握组织实权。三青团虽说基本上是由 CC 团和复兴社合并而成的，实际上却只能算是复兴社组织的后身，也就仍然是为黄埔系操纵运用

的一个政治工具。因此，复兴社在并入三青团以后，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而且比以前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了。其原有之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也完全原封不动地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更成为有着一块堂堂皇皇的公开招牌作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关于军事谍报部分则划入国防部，称为第二厅。原有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这个政工特务系统，则改隶于政治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防部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则并入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为军训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实际上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也没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但由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

曾 扩 情

刘健群到北平组织复兴社

1933年3月，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控制华北地区的时机到了，即以抗日为名，极力准备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统治机器；随即派刘健群到北平，秘密组织复兴社。刘曾任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又为蒋所特别赏识。1931年间，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写了《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蒋见而大悦。次年3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复兴社，刘健群的建议是起了促成作用的。事先经过相互填具调查表，送由蒋介石决定。填我调查表的人对我的考语是：“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近来腐化不堪，毫无斗志。”因而未被指定。当时我随国民党中央到了洛阳，没有参加成立会。据参加成立会的陈春霖来洛阳对我说，因康泽讲情，说我当过黄埔同学会秘书，应留点情面，才决定我任一名监察干事。我颇为失意，既未参加过干事会议，也未履行监察任务，只听命行事而已。非黄埔学生之被指定为核心干部者，只刘健群一人。随即发表他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主持全国军队政工，并命他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1000人左右受训，

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由于刘与何应钦、蒋介石有如上的关系，又有充分的人和事的准备，才不惜由军委会的政训处处长降而为华北抗日宣传总队长。复兴社，就是在这个名义掩护之下来到华北的。

蒋介石对复兴社在华北的任务曾交代如下：

（一）向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宣传：只有服从南京政府命令，在统一指挥之下奋勇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军队才不致为日本人各个击破，同归于尽。

（二）从思想上掌握驻在华北地区的军队，使之逐步地中央化：就是要全军官兵从思想上来拥护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在唯一领袖蒋介石领导之下，与日本人、和与反对国民党的唯一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如有阳奉阴违，态度不明的军队，当相机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手段。

（三）从思想和行动上控制社会各阶层人民，向他们宣传：国民党是唯一救国救民的党，三民主义是唯一救国救民的主义，蒋介石是唯一救国救民的领袖；如有从中破坏和反对者即视为公敌，应严厉对付之；尤其要与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持党和领袖在民众中的信仰，而巩固其统治。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设于北平，下分若干分队；每分队设分队长一人，队员十余人，凡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或师，都配属一个分队。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宣传总队改为军分会政训处，刘健群改任处长；各分队改为各军师政训处，分队长改任处长。

刘健群根据蒋介石交代的原則，先后在宣传总队和军分会政训处的名义掩护之下，秘密进行复兴社的组织活动，约略如下：

（一）复兴社本身不公开对外，作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其组织简单，设书记一人，负发纵指示之责；干事数人，负与有关部门联系及推动组织活动之责。

（二）从思想上来掌握华北各军，使之中央化，或从而瓦解之，是通过政训处来体现的。政训处处长就是复兴社公开活动的代表人，凡遇有大的集会和与有关部门商谈问题时，都由政训处处长或派人出面。其所辖第一科就是复兴社的宣传机构，除一般宣传外，着重于对华北各军的宣传和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其第二科就是复兴社的情报站，派在各军师的政训处为情报分站，负责对上汇报情报，对下搜集情报之责；除搜集一般的情报外，着重于搜集华北各军的有关情报。

（三）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的镇压和危害行动，是通过宪兵第三团来实行的。这个团就是复兴社的特务机关，下属三营，分别担任军分会所属部门的警卫；设有稽查处，负责调查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活动，从而采取镇压和危害的行动。

（四）对工商团体和农村的组织活动，是利用工贼、奸商和地方保甲人员来实行的。承认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为合法，而给予支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尽力奔走。

（五）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和危害活动，是利用青红帮和会道门的组织来实行的。认为他们的横行霸道和兴妖作怪为合法而给予支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在社会各阶层的有关活动和发展组织尽力奔走。

此外由戴笠派来娄兆元、卢起勋两人在政训处为挂名科员，专为戴笠搜集情报和担任有关行动之责，自去自来，不受政训处约束。类似这样的挂名科员，在军分会所属的部门，几无处不有。这些人不仅从事对外的情报活动，而内部人员的一言一行，认为有报告之必要时，也无不向戴笠兵报。因而军分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人无不存有戒心。

复兴社通过政训处在华北进行的活动

北平军分会政训处是华北军队政工的领导机构。其派赴各杂牌军队的政训处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服部队主官，建立他们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信仰，尤其对蒋介石的竭诚拥戴，以达到杂牌军队的“中央化”。军队政训处感到行之有效时，一面报军分会政训处，转报蒋介石召见杂牌军的主官，表示亲切的关怀；一面要求其主官听蒋介石的指调，到庐山训练团受训，以取得如同黄埔学生的身份，同蒋介石成为师生关系，部队的待遇与中央军相同。如此路不通，则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措施，如发现其部下人员中对主官情感不好，发生利害冲突时，就设法吸收那些人为复兴社分子，予以必要的支持，谋取主官而代之，或扯垮其军队。军分会政训处并规定各军政训处，按半月作如下的一般报告：（1）主官的思想言行；（2）主官与部属有无利害冲突；（3）士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4）军民的关系如何；（5）有无反对党派在军队中活动。

军分会政训处根据这些报告，拟具工作指示。如遇有临时的特殊情形，如长官与部属有决裂的情势，士兵有暴乱的情形，及发现反动党派有活动时，则随时具报，并转报何应钦或蒋介石，采取必要的措施。

1934年4月，刘健群调任南京复兴社书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由我继任。我从四川经平汉路到北平，一切照上述蒋介石对刘健群所指示的原则进行工作。是年6月，我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才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指示。他要我“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郛和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将领，以及西北军的宋哲元、庞炳勋等，表示尊重；各军师政训处处长对其军师长亦要表示尊重，使对政工人员发生好感；尤应谨慎从事，不得使部队长官有何怀疑”。又说：“至于你这个人，处事对

人，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是大成问题的，应该好好地改正。”此后我即本着蒋的意志同华北的将领们周旋。

对宋哲元，除一般访问外，遇有见面机会总称赞他在长城战役时，以大刀队而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使敌人望而生畏；不仅为我所敬仰，“蒋委员长”更倚为国家干城。对其亲信如秦德纯等，亦特别表示亲切。他们也对我表示好感，如宋哲元有一次由张家口来北平，特请我吃饭，有秦德纯作陪。我又重复地称颂了他一番，并说：“蒋委员长要我代为问候。”于是秦德纯说：“曾处长这一番话，对于我们的鼓舞，比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大。”

庞炳勋是在蒋、冯、阎战争时脱离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的；因此就更对他表示亲切和尊重，以老前辈称他。我去南阳访问他时，他对我闲谈什么叫唯物主义的问题，特举一例说：“有一家人死了一头驴子，全家无不痛哭流涕，随又死了一个老太婆，全家无不欢欣鼓舞。问其原因，则曰：前者是一个生产者死了，我们的生活无所依靠，故要痛哭。后者是一个消费者死了，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故特欢喜。”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就是如此而已。”我认为他这段话，对于反共来说，是有很大的煽动作用的。除当面称扬他外，还为他到处传播。南京陈立夫、张厉生等闻之，无不对他表示尊重和亲善。

至于对张学良，我不仅表面尊重他，而且认为他是真诚拥护蒋介石的代表人物，特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他。我在北平与王卓然、于毅夫、黎天才等，会谈有关“四维学会”问题时，无不开诚相见，我总是说：“我们如弟兄手足一般，要互助互谅，惟蒋、张两个领袖之命是从。”我到汉口时，无不向张请训，并曾随同他出巡过麻城一带防地，作为他的随从人员。我还本着他的意旨，会同黎天才招考了东北学生百名左右，送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分派在东北军队中作政工干部。张的谋士戴翼翘，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我同戴来往甚密，企图通过戴，使

张学良感到我对他的爱戴。我亦视我如好友。至于黎天才，是由张学良经蒋介石的同意，派来当我的副处长的，惟只负名义，不到处办公。我除每月送他生活费 500 元外，彼此相见，亲切异常，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

我对宋、庞、张等采取上述态度，意在使他们感到蒋介石的干部人员，看待他们如同看待蒋介石一样。尤其使张学良感到蒋介石是领袖，他亦是领袖，不仅对他爱戴，对他的亲信人员，亦如弟兄手足一般。这样就会对蒋介石表示真诚拥戴，服从其调遣，有如中央军一样了。这就是我对西北军，尤其是对东北军进行所谓“中央化”的活动。至一般的分化和瓦解的活动，仍令各军政训处相机进行。各军的政训处处长有：商震军为王超凡，于学忠军为林祥霖，冯占海军为余洒度，宋哲元军为宣介溪，庞炳勋军为陈春霖，何柱国军为黄乃安。

通过我及各军师政训处，对华北各军所采取的上述活动，取得了：政工人员与军队尚能安然相处，对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亦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个别的军官加入了复兴社；未发现对蒋介石有若何反对的表示。所有各军师长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临行时还送旅费，多至数万元，少亦数千元；因而感到蒋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好的对待，而引以为慰。如冯占海、刘多荃、何柱国等，得到了蒋的召见后，无不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

对 CC 派系和其他方面的运用

复兴社与 CC 系，因彼此的权利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状态。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 CC 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党部委员如詹朝阳等是 CC 的中坚分子。CC 为了加强反共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说

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 CC 与复兴社同属蒋反共的主要工具，在反共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不单是为了反共，而是我与 CC 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 头子陈果夫于 1929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国民党四川特派员，亦是陈果夫提请指派的。因此我不仅与 CC 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 CC 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 CC 团结一致反对共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反共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 CC 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 CC 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北平市长袁良、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欲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

（一）对黄郛：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闹出无穷的

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 1929 年间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时，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一处，逮捕中共人士彭湃等 20 余人。除有一个黄埔第一期同学，蒋介石特派我向袁良交涉释放，企图借此怀柔其他黄埔的共产党同学外，彭湃以下人士，曾被用尽了非刑拷打，然后一律转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执行枪决。袁良又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当北平市长时，以评剧艺人白玉霜所演的戏剧有伤风化，把她赶出北平。由于这些关系，我特对袁表示好感，认为，他在上海对中共组织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共产党，为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又认为他赶走白玉霜以维风化，不愧为正人君子，堪为当市长的人的榜样。随即要求他与我们通力合作，并请他关照其警察局局长余晋和，与宪兵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维持北平的治安。从此他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三）对余晋和：除请袁良关照他外，特劝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不仅对他要有和蔼的态度，而且要分工合作，彼此无妨。因为反共行为，不是宪兵团所能单独作得了的。同时我亦向余表示好感，请他有事可同我们商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使彼此的工作受到影响。他颇表同意，因而彼此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四）对邵文凯：特劝蒋孝先要以长官的礼节来对待他，于必要时还得向他请示和报告工作情形。因为他只是一个做官的人，并不想在工作中有何表现，只要官面子保持得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廖华平是我的四川同乡，彼此有交谊，特关照他，既然是邵文凯的秘书，就要对邵文凯所交办的事情认真负责，要这样才能掩护自己的特务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我对邵文凯特别表示好感，并为蒋孝先辩解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不会处人处事，但心地不坏，可用长官的身份来教导他。”从此，邵文凯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牢骚了。

对日本的情报活动，是由戴笠所掌握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

的。关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制造种种借口，向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等情，我们曾多方调查除公开协定外，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条款，终无所得。何应钦亦死不承认有何秘密条款，在梅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时，日本的特务浪人，在平、津一带横行霸道，极尽挑衅之能事。这是与梅津的无理要求紧相配合的。

复兴社在华北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概况

复兴社在华北的组织，除军分会政训处与宪兵第三团为其基本组织外，所有在各大学发展的组织，由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负责进行。其在社会各阶层所发展的组织，是利用奸商、工贼、青红帮、会道门等来进行的。凡有社员 3 至 10 人，即成为一小组，由组长一人掌握，以与宪兵团的行动相配合，为宪兵团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通风报信。至对军队驻在区的民众的组织，则利用保甲人员来进行，在军队中的组织活动，则由各军师政工人员暗中进行。

复兴社在平、津各大学所搞的军训，名虽灌输学生军事常识，而主要目的却在于借军训以约束学生和考查学生的思想行为，凡是认为可供利用与共产党作斗争的学生，即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并在其中物色坚决反共的学生培养成为职业反共分子，专门从事对共产党学生组织活动的破坏和迫害；并与军警暗通消息，作军警逮捕共产党学生的引线人。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津贴和升学的便利。每逢夏令集中军训时，挑选未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为合格。这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大好时机，并拟定种种专题分组讨论，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如对讨论的题目有持异议者，就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捣乱的学生，予以严厉对待。1934 年夏天，在北平黄寺，集中高中以上学生 2000 余人从事军训，在讨论“如何安内攘外”的问题时，有一学生独持反对

论调，立即把他绑起来，向众宣布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学生。”当时主持训练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就令把这个学生押送出队。其结果如何虽未得知，可以肯定，必难幸免。

关于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活动：除在长城战役时期，有一度抗日宣传外，至塘沽协定签订、华北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转而作一般的宣传。于必要时，散发“拥护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信仰三民主义”等等的传单标语。对南调到湖北、河南一带的何柱国、董英斌、刘多荃、王以哲、庞炳勋的军队，特着重于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要穷人的命”云云。至于系统地宣传法西斯思想，当时复兴社在北平曾办有《北方日报》与《老实话》等刊物。前者除表白坚决反共和作一般的新闻报道外，其所刊行的文章，不外对蒋介石所讲的力行哲学等反动思想进行阐述而已。后者则采取词句比较生动有趣的体裁，以吸引一般青年学生的阅读，争取他们对蒋介石的崇拜。

此外在北平还有由管翼贤所办的小《实报》，着重社会新闻的报道；由成舍我所办的《世界日报》，自认为是民间报纸，不属于什么党派。特由主办《北方日报》的王辉明，主办《老实话》的张佛千同他们取得联系，互通消息和互登有关的文章。至天津的《大公报》，曾由我亲自去天津，与其经理胡政之接洽，要他多发表我们的有关文件，如讲演词和有关宣传的论文等等。

至于我个人则以政训处处长名义，在某一次所谓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民族建设纲领》的讲演；还对黄郛所成立的县政人员训练班，讲了一次如何当一个好县长的讲话。其他对保定集中军训的讲话、对华北学院学生的讲话、对北平市党部的讲话，以及访问东北和西北各军师长的讲话等等，对象虽不同，而所讲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一套，企图通过这些讲话，建立各方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

的信仰，在其领导之下，为反共而牺牲奋斗。

复兴社在华北的罪行

复兴社在华北的有关部门，如政训处、宪兵三团及各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等等，都对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而宪兵第三团的罪行尤为突出，因为它是复兴社所掌握的首要特务机关。诚如阎宝航先生所写（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中所说：“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直言之，也就是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及一切进步人士之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当时我对宪兵团，认为是分所当为，既满足了复兴社的要求，也表达了我个人的意愿，只听见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对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采取镇压和迫害的行动，尤以镇压和迫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多。我所知吉鸿昌被杀害的情形，追述如下：

吉鸿昌和任应岐等爱国军人在天津被刺，后解到北平被何应钦枪杀，起初我也是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后来戴笠派在政训处任挂名科员的卢起勋告诉我，才知道这一暗杀案子是由戴笠派其重要人员郑介民亲来华北主持、策动、指挥卢起勋和其他人等所干的。事情出在天津的国民饭店，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周密布置才达到目的。当时复兴社骨干分子，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极端仇视，嗜杀成性，只要听说是共产党就格杀和监禁，根本用不着什么法律和手续。瞿秋白先生对血腥屠杀有“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诗句，就是恰好的写照。

复兴社被日本人赶出华北的经过

1935年6月日本人一定要把复兴社所属的政训处和宪兵团

以及有关的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赶出华北，并列入于“何梅协定”的条款中。我当时看来：并非政训处与宪兵团对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有何大不了的妨害作用。虽在长城战役时，华北宣传队曾有一度抗日的宣传活动，到塘沽协定，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着重于对华北各杂牌军队的控制活动，已无若何抗日的宣传，只不过一些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等等的例行传单标语而已。到我继刘健群任政训处处长时，更由抗日宣传转而为反共宣传。我虽曾讲了一次《民族建设纲领》，说要建设一个统一的民族，仍不外于一般理论的空谈，说不上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生什么坏的影响。至于宪兵团专从事破坏和镇压共产党人及一切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不惟无碍于日帝的横行霸道，而且与日帝的意图不谋而合。但在日本人看来，宪兵团在华北的行动，尽管与它的意图相合，但毕竟不是它自己的宪兵团，能够为所欲为。归根结蒂，不仅要南京政府在北方的统治归于“实亡”，而名亦不许存在。这样，它才好作为一个地方问题来处理，以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的目的：所以名虽赶走政训处与宪兵团，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两师军队，其主要的目的却在于赶走军分会。事实正是如此，在政训处等被赶走不久的期间内，军分会就不能不自行撤退，让位于地方性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了。

日帝为了要达到赶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目的，在何梅协定前，就对政训处和宪兵团采取种种威胁和挑衅的措施。其散兵游勇和特务浪人，常来政训处门前东张西望，窥伺侦察；更在我住所门前来来往往，监视我的进出。他们对宪兵团更极尽挑衅之能事，不仅当着宪兵辱打人民，调戏妇女；而且凡宪兵守卫的地方，如中南海何应钦所住之处，无不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在卫兵的刺刀上划洋火点烟，对着营门小便等等野蛮行动，真举不胜举。更不分昼夜地闯进何应钦住所，作种种横蛮无理的要求，说政训处不仅是宣传抗日的专门机构，而且是对日本人进行破坏和危害的指挥部，如：义勇军孙永勤在长城附近的

抗日活动和天津汉奸记者白逾桓等之被刺死，都说成是政训处暗中策动的。还硬说：宪兵团有危害他们的暗中布置等等。政训处与宪兵团必须取消而列入于何梅协定的条款中，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所逼成的。

何应钦对日帝的无理要求和野蛮行动，不以为耻，反作为签订卖国协定的辩解。他于签订协定前对我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说：“中国招来这样严重的外患，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武装暴乱、破坏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家统一后，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与日本人签订协定，求得暂安。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得到了委员长的许可，黄委员长（指黄郛）的赞同的”云云。我原对日本的横行霸道，无理要求，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切齿痛恨，但听了何应钦这一段话，为了暂时的苟安，也就认为签订协定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蒋介石于 1935 年春，在未去四川督促“剿共”以前，特到了北平一次；并有王宠惠同行。黄郛特于蒋到达的晚间，在旧外交大楼设宴为蒋洗尘。除军分会和政委会的高级职员参加外，作陪的有吴佩孚和亲日派的陆宗輿等。黄郛只说了几句欢迎蒋介石的话。蒋也只谈了“是来看看大家，望大家在黄委员长指导之下和衷共济，以保持华北的安定”的几句话。我急欲想见他报告和请示一切，未得许可。他即匆匆回到南京，经由贵州到四川去了。蒋突于这个时期，匆匆来北平而又匆匆地离去，同来的又是曾在北洋政府时代办过外交的王宠惠；黄郛设宴欢迎，又有亲日派的陆宗輿等作陪。不难看出蒋是与黄郛、何应钦等密谈如何与日本求得妥协，以便乘红军进入四川的机会，用全力来解决四川问题。距离蒋介石匆匆离开华北不到四个月的期间，就有何梅协定的签订。这足以证明何梅协定之签订，是与蒋介石之到北平有关的。

我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不料遭到日本浪人横加监视，咄咄逼人，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颇想一走了事。适在何梅协定签订的次日，蒋介石电召我到成都有所指示，我即复电，遵即首途前去。

我到成都，把日本人的横行霸道等等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他无甚表示，只说：“已在西安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你可当那里的政训处处长，把北平政训处的人员率领到那里。你要听张副司令的命令，好好地努力工作。”

关于派在华北各军的政工人员，令其各自离开，回到南京。

复兴社在福建的发展情况

李景春

复兴社在福建活动，自 1933 年 11 月起至 1939 年止前后共 6 年，我在该社担任分社助理员及支社助理书记达 3 年之久。

初期发展情况

早在 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时，复兴社即在福建开始活动。同年 12 月在厦门成立支社，由林斧荆（黄埔军校一期）负责。至十九路军失败后，1934 年春复兴社才在福州成立分社，由萧乾任书记。厦门仍设支社。当时福州分社和厦门支社，社员总共只有数十人，多分布在福州、厦门两地的军宪及水警机关。

福州分社下又先后成立了三个外围组织：

一为中华复兴会，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为复兴社之外围，其一切章则制度与复兴社同，书记为卓高煊（保安处上尉科员），助理书记欧阳恢甫，助理员刘文熔。1935 年福建复兴社组织以发展太快、分子不纯，奉总社令暂停发展社员，从事内部考核。在 1935 年至 1936 两年，福州分社停止发展社员，以发展复兴会会员为代替，主要在军宪警和学校方面发展。两年中发展到百余人，如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师范学校各成立了一个小组。

复兴会所有会员都是中下层人物，没有一个上层人物。1937年春复兴社总社书记长邓文仪来闽视察时，解散复兴会，将会部会员百余人转正为复兴社社员。

二为青年学术研究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是中华复兴会的外围。会址附设在道山路南方日报社内，出版一种叫做《突击》的月刊，由宪兵第四团政治指导员余钟民负责。青年学术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始向各学校活动，拉拢学生入会，鼓励向《突击》投稿。约在1934年下半年，研究会在协和大学及福建学院发展部分会员会，乃进行改选，选出福建学院学生罗佑、协和学生郑惠宝等为干事，加紧向各学校发展会员。1935年上半年，该会曾在东街文艺剧场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会，聘请协和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天兰主讲，听讲者除小部分是青年学术研究会会员外，大部分皆是复兴社社员及中华复兴会会员，总共也只有数十人，别无他人参加。至1935年底，青年学术研究会因无何发展作用，遂停止活动。

三为忠义救国会（以下简称“忠救会”），发展对象为下层人物，如工商界公会职员及交通员工等，成立时由郑寰雄任书记，发展会员七八人，编为两组，继郑寰雄之后任书记者，有叶镜允、林琪、王调勋等，组织均无多大发展。至1938年林君扬任书记时，充实组织，设办公地点于三民里（即现在的新民路），极力发展组织。林君扬任书记后，就以“蓝衣社负责人”作幌子在外招摇撞骗，扩张其个人势力来欺压人民。“忠救会”发展对象原只限工商界，但是林君扬不按照规定，不管属于哪方面，能被她拉到的都要。

兴 盛 时 期

1937年至1938年为复兴社在福建最兴盛的时期。1937年春总社新任书记长邓文仪由广州飞闽视察，在福州作两天部署活

动，对人事调整与恢复组织发展有所指示。邓到达之日，当晚即召集小组长以上骨干分子数十人在青都观宪兵第四团团部开会，由邓文仪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并指出今后应当发展组织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翌日上午邓又分别召见小组长以上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多数小组长皆对分社书记杨群提出意见，说他地位太低，能力薄弱，不能起领导作用，全体社员对其表示不信任，要求撤换。邓乃以新任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叶成接充分社书记。第三天上午8时在南方日报社参加中华复兴会会员转正为复兴社社员的入社宣誓仪式，并担任监誓人，会毕即离闽飞南京。

叶成任分社书记后，即按照邓文仪的指示，发展福建组织，将办公地点迁至其道山路家中，并充实工作人员。约两个月后，福州同时成立两个支社，第一支社代名为“任光忠”，属于军警方面；第二支社代名为“任光义”，属于文教方面。不久漳州、泉州亦先后成立支社。1937年底分社助理书记戴仲玉调任永安县县长时，永安亦成立一个支社，由戴仲玉任书记。闽东、西、北地方虽无成立支社，但亦指定各县军训教官或派驻的保安团队负责人担任组长，负责发展联系工作，一年之中，社员发展达数百人，遍布全省各县，可谓盛极一时。抗战开始后，为适应战时体制，分社改称总队，支社改称大队，大队之下辖若干中队，每一中队辖三个小队（系小组改称，在不属支社的各县仍称组），组员改称队员。大队长、中队长均改派军校出身的人担任。1938年初，为节约开支，精简了机构，取消福州一二大队名义，改为中队，合并于总队，郑山端任军警中队助理，张矩严任文教中队助理，另挑选福州籍社员十余人成立一个独立分队。成立独立分队的目的是，一旦福州被日军侵占，不作撤退的部分小学校长、教员仍可以潜伏在福州活动。